

古籍版本鑑賞

——從珍惜善本祕笈說起

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

盧錦堂



在珍貴文化遺產日益受到國際間重視的今日，古籍善本蒐藏自亦隨而成為其中一個注目焦點；古籍數位化更是各重要古籍典藏機構的發展主流。從根本上說，珍貴古籍具有文物價值，版本的真偽優劣尤其不容忽視，因此，古籍版本鑑定既屬專門，又是必要，無論公私典藏，抑或推廣利用，都應留意此一基本功夫。

本專欄擬每期一個篇題，整體論述範圍包括古籍版本鑑定的方法、作偽的辨識、各類版本的選介、版本常識中若干問題的解說，並旁涉古籍的現藏情況、編目著錄、修復維護、影印重製、拍賣行情等相關項目；盡量多舉例證，輔以書影，必要時酌增注釋，篇末還附加「延伸閱讀」，列出重要參考書目。總之，期望對公藏機構或個人蒐購古籍，能有所助益；若慣閱現代圖書的讀者又因而引起進一步探究傳統文化的興趣，從了解鑑定的過程中更能懂得如何賞識古籍，則尤為萬幸。



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2002年夏，從一舊書商手中得見一部二十四卷本，唐王冰註，宋林億等校正的《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完整無缺，說是宋版，高價購自大陸某地。但經初步觀察，感覺該書紙張十分可疑；而最明顯的是，各冊內文首葉的同一藏書印，印色不一致，應是影印套色所造成，不是鈐印上去的；書中看似手寫的題記，墨色並未滲透紙背，實屬影印；何況近時在坊間，如拍賣市場等出現的宋版書，多是殘卷零葉，罕見一部完整的，因此認定該書並非宋版原刻，不過是影印本而已。隨後，在今人所編一部記述中醫古籍版本的書中，得知有1922年憚鐵樵影印本，所附書影，其中藏書印即與前述舊書商的本子相同，（注1）由此更取得影印的明證。從事古籍買賣，可因不明版本而導致金錢上的損失，不得不格外慎重。

其實，不明版本所導致的損失，主要的還不是金錢方面。古人著述中不乏有關誤用劣本的笑話，如明陸深在《儼山外集》卷八《金臺紀聞》下記載：「金華載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酬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麥芽糖）字

耳。元禮急為正之。嗚呼！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則是一字之差，足以誤人性命。又見詩文名篇流傳，有賴於善本，如宋歐陽修《六一詩話》所記一則故事：「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猶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昆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西昆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則是一字之差，涉及創作優劣。上述事例亦同時證實對古代文獻的整理研究，版本鑑定無疑提供了可靠資料。再者，同一古籍，會有多種版本行世，如唐代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著名詩文集，其中時代有早晚，刻印分優劣，都有鑑定的必要。此外，還應留意一些刻本，由於刻書者妄加刪改，或是書商為了牟利，草率從事，如明萬曆間刊本《雲間雜識》，原八卷，有者殘存前三卷，書商即把卷一、卷二、卷三挖改為卷上、卷中、卷下，就這樣以殘本冒充全書，若不經鑑定，信以為真，則錯誤可想而知。（注2）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

古籍善本的訪求

從古籍版本的鑑定中，發覺珍貴的圖籍愈漸不可多得，這種情形長久以來即已存在，所以藏書家無不千方百計訪尋善本。以古代為例，劉尚恆《略論中國藏書文化》一文即記載說：「宋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竭其俸入，以事鉛槧”，“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見《藏書紀事詩》卷一）。明胡應麟“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見《藏書紀事詩》卷三）。清馮舒、馮班及何大成，聞寒山趙氏有宋刊《玉臺新詠》，于冬月“朔風飛雪中，挾紙筆，袖炊餅數枚入山，徑造其廬，乃許出書傳錄，墮指呵凍，窮四晝夜之力，抄副本以歸”（見黃琴六《第六弦溪文鈔》卷二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陸澐自言：“十五歲家貧失學，喜借書，晝夜抄寫。嚴寒乏炭，屈足腹下，冷暖交換，見者匿笑”（見《藏書紀事詩》卷四）。還有用自己的山莊、田地，甚至美婢去同人家換書的，明代王世貞、朱大韶、清代馬思贊，就有這類例子。至於斷圭殘壁的好書，為了使其延津之合、浦合珠還，經年求索。明代徐燾藏的《何氏語林》花了二十年的精力，東尋西訪才配成完帙；清代郁禮藏厲鶚的《遼史拾遺》手稿，中缺五十紙，結果從拾字僧的廢紙簍中得之。」（注3）

即使時至近今，愛古成癖，亟力追求善本的亦大有人在。如革命元老劉禺生，與大學者，也是同盟會中人的黃侃私交甚篤。某日，黃侃到劉家去，劉不在，劉母見當時黃侃似有心事而悶悶不樂，於是說書櫃裡有一部書，可瞧著解悶，黃侃拿在手上一看，隨即借走。自此以後，黃侃常送善本給劉禺生，而對借去的該書，則絕口不提。該書即《柳下說書》，是清康熙時著名說書藝人柳麻子所著，他不僅說書極有名，且本人又富有傳奇色彩，他的書數百年間見者不多，難怪黃侃取去後即秘不示人。黃侃的知交汪辟疆為見該書，也無時不在想著辦法。他熟知

黃侃最愛吃酒及美食，於是擇日邀約黃侃赴宴，酒足飯飽後，提出觀書的請求。黃侃勉強答應，領汪進入內室，從床下一隻上鎖的鐵箱中取出《柳下說書》。汪觀書畢，逼問他是否屬劉禹生物，黃大笑說：「此書已裹以黃麻，入黃閣矣！」可嘆劉禹生每見黃侃不時以善本相贈，還莫明所以。（注4）

善本既難訪得，於是藏書家無不以惜書為鑒。如國家圖書館藏明覆元刊本《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鈐有清王昶的藏書印記：「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勤；願後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墜；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菴傳誠。」語氣似太嚴厲，卻是護書心切。又如國家圖書館藏明邵寶《對客燕談》一卷，明嘉靖十五年（1536）姚咨傳鈔本，護葉上有清張蓉鏡一血書大「佛」字，并跋稱：清道光己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二十九日丁酉吉辰戌刻展讀一過，以血書佛字於首葉保護，以免蛀厄云云，甚至希冀神明的力量，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政府支持不可或缺

雖然歷代藏書家不乏視書如命的，但畢竟屬於個別行為，後代子孫能否繼承先人遺志，固是問題；即使書籍幸得傳人，諸如淹水、失火、竊盜、戰亂等天災人禍的發生，又難免要遭受重大毀損，甚至因而湮沒。現今古籍善本多歸於公藏，正因為公家機構較具備維護力量與典藏條件；而政府的重視與支持，更從各種災難中搶救了不少珍貴文獻。下面試就抗戰時期國立中央圖書館在上海秘密蒐購古籍善本，以及近年上海圖書館以高價購入常熟翁氏世藏圖書二事舉例說明。

江南一帶，自明以來，即出現不少藏書世家，抗戰初期，多為生活所迫，不得已出售先人遺籍，因而善本書逐漸流入滬肆。當時上海有識人士，如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鄭振鐸等深恐此等國家重要文化財淪落異域，於是在1939年底及1940年1月5日先後聯名致函或拍電報給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促以政府力量搶救這些善本；至1月10日，鄭振鐸已見著重慶方面兩份回電。而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蔣復璁主任更早奉令負責聯絡有關事宜，於元旦即從重慶出發，先抵香港，再潛赴上海。上海自淞滬戰役後，被日軍強佔，租界即成為「孤島」。蔣復璁此次冒險至「孤島」一行，經與鄭振鐸諸人商議，決組「文獻保存同志會」，用該會名義對外活動，以避敵偽耳目。「同志會」第四號工作報告書上說：「竊謂國家圖書館之收藏，與普通圖書館不同，不僅須在量上包羅萬有，以多為勝，且須在質上足成為國際觀瞻之目標。百川皆朝宗於海，言版本者必當歸依於國立圖書館；凡可稱為國寶者，必當集中於此。」但美、日諸國覬覦我國重要典籍多時，此刻正想趁機搶購，而北平、上海兩地書肆更推波助瀾，同志會所遇重重困難，可想而知，正如「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書所說：「若我輩不極力設法挽救，則江南文化自我而盡，實對不起國家民族也，若能盡各家所藏，則江南文物可全集中於國家矣，故此半年實為與敵爭文物之最緊要關頭也，我輩日夜思維，出全力以圖之。」經歷艱苦的蒐購過程，直至1941年底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有見於局勢更壞，上海租界亦將不

保，以致活動不得不暫停。為期雖不到兩年，卻購得珍貴古籍4,864部，48,000餘冊，可抵得過當時北平圖書館善本的數量，何況這批藏書所代表的意義尤其重大，不可一般而論。（注5）

常熟翁氏在晚清歷史上占有特殊政治地位，亦是著名藏書世家，藏書自翁心存（1791 - 1862）開始，他的藏書後為長子同書（1810 - 1865）、幼子同龢（1830 - 1904）所繼承，其中最重要的是後者。不過，翁同龢藏書秘不示人，直至民國初年，甚至沒有人知道這些書的下落。其實，他的藏書在1947年華北戰局趨緊時已由留學美國的五世孫翁萬戈轉運至美。1985年翁氏藏書出現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由華美協進會主辦的中國古籍善本展覽中，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震驚。後來，中國嘉德公司與翁氏密切接觸，至1999年秋達成協議，擬將藏書整批拍賣或轉讓給中國一級收藏單位。最初，北京國家圖書館按程序展開申請購藏的工作，但在資金籌措的考量和靈活性上，上海方面後來居上。結果，上海市政府以最快的工作效率，在一個月內即作出決定，由上海圖書館經辦，多方籌措基金，捷足先登，而於2000年4月入藏了這批80種，542冊，價值459萬美元的善本書。這是近年古籍典藏的盛事。（注6）

從上述事實可知，若沒有政府的支持和主事者的識見，則大眾很難鑑賞到這許多珍貴文獻，這是首先要了解的。

注 釋

注1：吉文輝、王大妹主編，《中醫古籍版本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5），頁97-98。

注2：參見魏隱儒、王金雨編著，《古籍版本鑑定叢談》（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4），頁10-11。

注3：劉文在、黃建國等主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7），此處所引見頁25。

注4：事見陸昕，《閒話藏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8），頁64-65。

注5：有關國立中央圖書館抗戰時期蒐購古籍的舊檔案，現保存於國家圖書館特藏組。此外，可參考：（1）蘇精，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35：5（1979.11），頁109-114。（2）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5：1（1983.4），頁73-102。（3）劉哲民等編，《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8）。（4）陳福康，《鄭振鐸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8），頁406-421。（5）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87年1期（1998.6），頁1-22。（6）盧錦堂，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92年2期（2003.10），頁125-144。

注6：參見：（1）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編，《常熟翁氏藏書圖錄》（上海：上海科學技

術文獻出版社，2000)。(2) 翁氏藏書回歸始末專輯，《典藏古美術》，93期(2000.6)，頁24-31。(3) 王世偉，常熟翁氏六世藏書入藏上海圖書館始末，《收藏》(西安)，95期(2000.11)，頁9-10。

延伸閱讀

《藏書家》(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4月出版第1輯。



◀ 清翁方綱《復初齋稿》138冊，為國立中央圖書館抗戰時期所蒐購善本之一種。此葉書眉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管理中央庚款董事會保存文獻之章」二印記，是在書運至香港時鈐上的。